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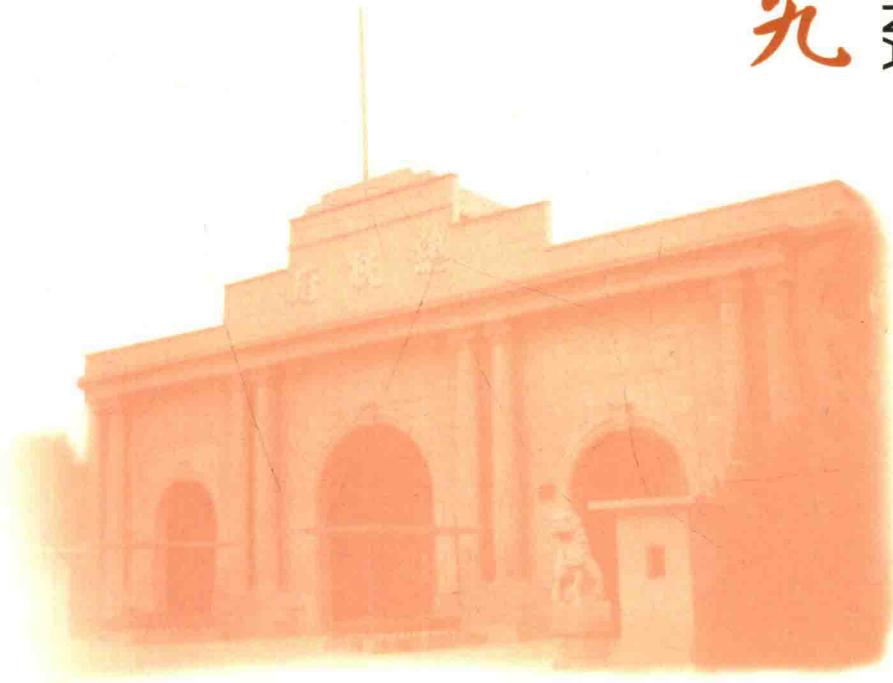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总第28辑
2015年秋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國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2015 年秋季号 总第 28 辑

主 编 / 张宪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研究·2015年·秋季号·总第28辑 / 张宪文主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ISBN 978 - 7 - 5097 - 8254 - 5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研究 -
民国 IV. ①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7506 号

民国研究 (2015年秋季号 总第28辑)

主 编 / 张宪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赵 薇 夏仲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8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254 - 5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名单

中国内地(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张宪文	张 磊	李文海
李 玉	汪朝光	陈红民	陈谦平
茅家琦	金普森	姜义华	徐思彦
崔之清	章开沅	谢俊美	

港台地区(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玉法 梁元生

国 外(以中文笔画为序)

久保亨〔日本〕
方德万(Han J. van de Ven)〔英国〕
罗梅君(M. Leutner)〔德国〕
柯伟林(W. C. Kirby)〔美国〕
高念甫(Andrei N. Karneer)〔俄国〕
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意大利〕
裴京汉〔韩国〕

主 编 张宪文

副主编 陈谦平 李 玉(常务) 徐思彦

目 录

抗日战争史

-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及其特点 何一民 刘 楠 / 1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煤矿及其作用 薛 穗 / 26
抗战与成渝铁路建设 田永秀 / 39
试论国民政府黄委会在抗战时期的“以黄制敌” 胡中升 / 49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华北的反华宣传活动 翟意安 / 61
国民政府战时大学生救助制度及其绩效研究
——以重庆时期中央大学为个案 倪 蛟 / 73

经济史

- 近代铁路枢纽型城市发展中的权力构成
——以蚌埠与石家庄比较研究为中心 马陵合 江争红 / 85
民国山西厘金研究 李永福 何 伟 / 100
《国营事业管理法》再探讨 赵兴胜 / 113
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与合作金库 龚 关 / 124

民国文化与政治

- 产权视角下的溥仪小朝廷文物流失问题 孙 眇 刘 平 / 137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孔”与“拥孔”之争

- 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 李先明 孟晓霞 / 153
从《青年之路》看戴季陶对青年运动的态度 吕厚轩 / 162
胡适总统候选人与魏德迈来华
——1947~1948年选举中的美国因素 李凤成 张海林 / 173

问题考辨

- 张謇《复河海工程学校学生自治会函》成文时间辨 车志慧 / 184
顾颉刚何时成为国民党党员 陈 刖 / 192

学术综述

- 2014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李 婕 廖大伟 / 196
民国时期的留学管理研究综述 王 静 / 207
抗战时期社会生活变迁及解释逻辑
——“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志鹏 / 216
“抗日战争与西南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晓舟 卢征良 / 223
“民国政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梁 艳 / 228

稿 约 / 234

Contents

Special Topic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in the Southwest Rea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He Yimin, Liu Yang / 1

Coal Mine to Southwest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Its Function

Xue Yi / 26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from Chengdu to
Chongqing

Tian Yongxiu / 39

A Study of Means of Utilizing the Yellow River against the Enemy by the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Hu Zhongsheng / 49

On Japan's Anti-Chinese Propaganda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Zhai Yi'an / 61

A Study on the Wartime Students Assistance System of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Its Performance

Ni Jiao / 73

Monographic Study on Economic History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ailway Hub City
—Tak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engbu and Shijiazhuang as the Center

Ma Linghe, Jiang Zhenghong / 85

Study on Shanxi Liki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Li Yongfu, He Wei</i> / 100
Re-study on the Management Law of State-Run Enterprises	<i>Zhao Xingsheng</i> / 113
Agriculture Bureau, China Farmers Bank and Cooperative Treasury	<i>Gong Guan</i> / 124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ttle Court and Loss of Cultural Relic in the Palace	
Modern Property Right as the Angle of View	<i>Sun Fang, Liu Ping</i> / 137
Controversy on "Anti-Confucius" and "Advocate Confuciu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entered on the Case of "Confucius Saw Nancy" in 1929	
	<i>Li Xianming, Meng Xiaoxia</i> / 153
View of Dai Jitao to Youth Movement from Youth Path	<i>Lyu Houxuan</i> / 162
Hu Shih's President Candidate and Wedemeyer's Visiting in China	
—American Factors in 1947–1948's Election of China	
	<i>Li Fengcheng, Zhang Hailin</i> / 173

Academic Revisi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Written Time of Zhang Jian's Reply to Student Council of China Hohai Engineering College	<i>Che Zhihui</i> / 184
When did Gu Jiegang Become the KMT Member?	<i>Chen Zhao</i> / 192

Academic Review

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ROC in 2014	<i>Li Jie, Liao Dawei</i> / 196
Review on Management of Study Abroad Program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Wang Jing</i> / 207
The Changes and Explanation of Social Lif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 Summary of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Social Lif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Liu Zhipeng</i> / 216

A Summary of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Construction in South
West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Zhu Xiaozhou, Lu Zhengliang / 223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ROC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World War II

Liang Yan / 228

Call for Papers

/ 234

(目录英文翻译:[美]何稼书)

【抗日战争史】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及其特点

何一民^{**} 刘杨^{***}

提 要 近代以后西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多种原因，城市发展滞后于东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造成东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断裂的同时，也造就了西南大后方城市整体性跨越发展态势，这一状况可以概括为近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与结构性变轨。由于东中部的各种资源向西部迁移，西南大后方城市在战时国家战略的导向下获得了从政策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了新的城市体系。城市布局和城市类型也得到了较大改变，城市发展出现新的特点。抗战时期西南城市的发展不仅对支撑全面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20世纪下半叶西南地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大后方 城市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东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相继沦入敌手。至此，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被迫中断，东中部城市也在战争打击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但对于长期发展滞后的西南大后方而言，抗战军兴却为城市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因中华民族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以西南地区为重心，施以发展经济、改善交通、改良市政等诸多积极发展城市的政策。同时，西南地区各级政府和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的阶段性成果。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所教授。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所博士研究生。

间力量加大投入，促进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抗战时期，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南地区的城市一改抗战以前发展缓慢的态势而出现较为快速的发展，并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使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动，并为20世纪下半叶西南地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抗战爆发与中国城市格局的大变动

（一）抗战爆发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格局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各种现代性要素也传入中国，并逐步发酵，推动了中国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革，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此后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抗战爆发前，中国城市发展尽管有若干曲折，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发展变化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型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形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有相当多城市因现代商业贸易、交通和工业的兴起而出现转型，特别是部分重要开埠通商城市发展成为新型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近代工商业逐渐由东部沿海、长江流域向内陆地区扩展。民国前期，城市近代工商业较少因社会变动而遭到较大的破坏，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区地方政府，都竭力推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完善工商业立法，稳定财政和货币制度，试图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准备统一度量衡与货币制度，鼓励私营企业等。同时，随着全国城市近代工厂的建设，大量的资本投资于工业部门，工业资本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工业资本积累达到了21亿元。这些都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城市近代工商业的继续发展。当时海关关册对这种工业热潮做过如下记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厂满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棉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砖及水泥，烛、皂、玻璃、磁器等厂，年胜一年，中国所制纸烟，与进口者相竞，各处大城，自来水逐渐推广，印刷厂，多处已有。”^①

^① 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情形总论》，1917，第12~13页。

到 1933 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西安、青岛、南京、无锡、福州、汕头 12 座城市共拥有各类工厂（场）9679 家，^① 成为工商业中心城市。

2. 中国城市化兴起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也开始兴起，城市区域空间布局也出现变化。20 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与此前相较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为：（1）城镇人口数量大增，增速较前明显加快。1912 年中国城镇人口约为 3100 万，1928 年已达 4100 万，16 年间新增城镇人口 1000 万左右，相当于晚清 70 年间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② （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1912 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7.6%，1928 年增至 8.9%，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晚清 70 年间共增加了 1.6 个百分点，二者比较接近。^③ （3）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27 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达 260 多万，全国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有 5 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广州），新增加的城镇人口，除一部分为自然增长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仅有少数为外国侨民。^④ （4）各级城市的数量均有一定增长。5 万～10 万人的小城市由 1921 年的 48 座增加到 1934 年的 115 座。^⑤ 大中城市的数量较前有大幅度增加，“我国大都市如上海，人口在 200 万以上；北平及广州，亦在 100 万以上；南京、杭州、天津、福州、苏州、重庆等，均在 50 万至 100 万之间；宁波、绍兴、开封、南昌、镇江、佛山、济南、成都等，均在 25 万至 50 万之间；武汉三镇，在 1911 年，人口有 85 万，而至 1921 年，已增至 146.8 万。我们亦由此看到中国都市正在迅速的发展”。^⑥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有 194 座 5 万人以上的城镇，城镇人口共计 3101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46607 万人的 6.7%。其中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6 个，即上海（370 万人）、北平（今北京，157 万人）、武汉（129 万人）、天津（123 万人）、广州（116 万人）和南京（101 万人）；50 万～100 万人的大城市 5 个；20 万～50 万人的中等城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73 页。

^② 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近代中国》第 3 辑，1993，第 94～95 页。

^③ 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近代中国》第 3 辑，1993，第 94～95 页。

^④ 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近代中国》第 3 辑，1993，第 94～95 页。

^⑤ 殷体扬：《我国都市化的问题》，《都市评论》第 11 期，1934，第 2 页。

^⑥ 杜修昌：《农村与都市之关系》，《中华农学会报》第 101～102 合期，1932，第 86 页。

市19座；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48座；5万~10万人的小城镇则增加到116座。而一些边疆地区的城市出现较快发展。如东北三省在1875年仅建有9座县城，经过清末民初的边地开发，到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城市数量大增，而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等，这6座城市的人口合计达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以上。^①

3. 城市区域空间布局极不平衡

历史上，中国区域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以后，不平衡状况更加突出，差异化发展明显。抗战前，中国城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较鸦片战争前有很大的进步，但发展极不平衡，部分大城市已经可以跻身于世界发达城市行列，大多数城市仍然落后。“现在我国的大都市，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北平，从经济集中方面说，确已做到和外国城市一般地位。”^②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城市人口集中度方面的不平衡和城市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其时，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城市集中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相当数量，这4座城市的“都市人口已占420万，即已占全国都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即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③。如果加上当时的另外五大城市，大都市人口所占比重则更高。据1932年、1933年调查，当时中国八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7888647人。^④其时中国的区域分布也极不平衡，邹豹君在抗战前对中国城市的区域分类统计研究表明，内地各省共有各类城市1635个，另外东北四省有173个，边地六省有152个，蒙藏地区有25个，其所占全国城市总数的比例分别为82.36%、8.73%、7.65%和1.26%。^⑤

（二）抗战期间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态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4个月零18天，东北全境城市均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⑥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福建、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大部分城

^①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326页。

^② 殷体扬：《我国都市化的问题》，《都市评论》第11期，1934，第3页。

^③ 易家敏：《中国的都市问题》，《民铎杂志》第5期，1921，第9~11页。

^④ 《南大经济》第2期，1933，第12页。

^⑤ 邹豹君：《中国都市分布与地形（附图表）》，《师大月刊》第15期，1934，第129~132页。

^⑥ 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70~81页。

市，以及湖南、广西等省的部分城市先后沦入敌手，东中部沦陷区域的城市在战争初期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经济凋落；继而被日本军队占领，城市严重衰落，成为日军在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和继续向中国大后方进行侵略的基地。中国东中部城市的渐次沦陷，使中国数百年来所积累的传统城市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成果大量毁于战火。

当东中部沦陷之时，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和西北的陕西、甘肃等省成为支撑中国进行持久抗战的大后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机关、学校也从东中部城市向西部地区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也为西南、西北地区大后方城市带的发展来了巨大机遇。

1. 西南大后方城市现代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在地区分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一部分工厂内迁、内地各省人口增加及抗战需要等原因，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有所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发展。战时内迁工厂及新建的工厂大部分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贵阳、兰州、宝鸡等城市。这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特别是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在特殊的条件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首先，抗战期间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建设是以军需和国防为主，国民政府投资向重工业倾斜。西南大后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工业的比重超过了轻工业。抗战以前，大后方的工业十分薄弱，工业结构则是以轻工业为主，其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所占比重最大，重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大后方的水电、冶炼、金属、机器制造、电气制造等主要的重工业（或称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在中国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工厂数为6.03%，资本额为4.04%，工人数量为7.34%。^①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大后方以轻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增大，轻工业的比重减小。据1943年的统计，大后方有工厂5266家、资本4.8亿元、工人36万，其中重工业类型的工厂有3195家，占工厂总数的60.67%，重工业资本3.23亿元，占总资本额的67.29%，从事重工业的工人19.95万，占工人数量的55.42%。^② 另据统计，抗战内迁大后方的工业企业若按厂矿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迁入总数

^① 凌耀伦：《中国近代化与中国资本主义》，《凌耀伦先生论文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第106页。

^② 李紫翔：《从战时工业论战后工业途径》，《中国银行月报》（复刊号）第1卷第1期，1946，第153页。

的 40.4%，纺织工业占 21.65%，化学工业占 12.5%，教育文化工业占 8.26%，电器工业占 6.47%，饮食品工业占 4.91%，钢铁工业占 0.24%，其他工业占 3.79%，矿业占 1.78%。^① 由此可见内迁工业之重心乃在机械、纺织、化学等行业。以上统计充分说明战时大后方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自 19 世纪中后期近代工业产生以后重工业比重过低的状况，这对于推动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内迁工厂大大促进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工业体系的逐渐完善，基本满足了抗战的需要，并对主要城市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到 1940 年底为止，东中部迁往西南大后方的工业计有机械、冶金、纺织、化工、军工、电器、纺织、食品、文教用品等行业，其产品有机械、兵器、工具、棉布、电器、电池、医药器材、药品、仪器和仪表、油漆颜料、罐头食品、文教用具等 16 个大类。^② 此外，大批内迁机器制造厂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装备；占内迁工厂几乎一半的机器制造工厂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大后方机器工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仅一年时间数十家内迁机器厂已致力于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的研制和生产，恒顺、上海、新民、顺昌、陆大、合作等大中型机器工厂能制造整部机器，中国植物油料厂机器厂生产的榨油机，允利厂生产的面粉机，渝鑫、恒顺生产的鼓风机，新中生产的煤气机等，均已达到专业化程度。^③

西南大后方各省工业之增长要以四川为最速。东中部内迁工业企业以迁往四川省的为最多，占内迁总数的 54.67%；湖南省次之，占 29.21%；陕西占 5.9%；广西占 5.11%；其他各省占 5.11%。^④ 若以内迁器材而论，7 万吨器材中，四川占 4.5 万吨，湖南、陕西各占 1 万吨，广西占 0.3 万吨，其他各省仅占 0.1 万余吨。1938 年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 240 余家，但至 1942 年底已增至 1600 余家，较前增加了 6 倍左右；其次为湖南，1938 年以前共有工厂 90 余家，1942 年底增加 4 倍；再次为陕西，1938 年的厂数为 70 余家，1942 年底增加 4 倍以上；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业之增进均大体类此。^⑤ 此种情形，对于后方工业区域之分野，有莫大

^①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 5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 232 页。

^② 周勇主编《西南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6，第 401 页。

^③ 周勇主编《西南抗战史》，第 401 页。

^④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 5 卷，第 253 页。

^⑤ 唐润明主编，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出版集团，2012，第 622 页。

之力量。总之，三年半之工厂迁建运动对后方工业之影响实至深且巨。^①

总之，经过抗战爆发后数年的努力，大后方工业已大异旧观。到1942年，西南各省（包括西康）共有各类工厂2176家，已占国统区工厂总数（3758家）的57.9%；资本总额154220.3万元，占国统区资本总额的73.54%；共有工人147257人，占国统区工人总数的60.93%；共有动力设备90508匹，占国统区动力设备总数的62.88%。^②内迁工业带动了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更改变了中国的工业结构。

作为中国生产力布局大调整时期的抗战内迁，给西南大后方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现代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例如，重庆工业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根据各种资料核算，迁渝工厂达243家，占迁川工厂总数（260家）的93.5%，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4%。^③重庆之所以成为内迁工厂的主要目的地，主要是因为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投资环境和大城市的聚集效应。重庆有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广大的腹地提供农产品等工业原料，有川江航运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重庆又是四川和西南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同时，国民政府对于重庆在大后方经济中的地位也给予了重视，把工业经济的重心放在重庆，将东起长寿，西至东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区域，划为重庆工业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经过短短两年的时间，重庆工业区已经初具规模。据1940年《经济部报告》提供的数据，是年重庆工业企业达到429家，分别占西南和大后方工业总数的50.7%和31.7%，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生产新格局。在抗战以后的几年内，贵阳的工业企业数量和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942年、1943年两年中新成立的工厂就达41家之多，占历年所设工厂总数的61%。西南大后方主要城市的工业部门结构相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没有的一些重工业行业，如机械、动力、化学、电器、水泥等都从无到有，甚至有的行业有较大的发展，如贵阳的机械、动力、化学、煤矿、水泥和电器等行业的工厂数共49家，占73%，资本总额4527.6万元，占78.9%。^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大量物资和人口的内迁，西南大后方城市的商业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例如陪都重庆，不仅是全国的工业重心，其商

^① 唐润明主编，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622页。

^② 袁梅因：《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经济汇报》第9卷第5期，1944，第86~87页。

^③ 魏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215页。

^④ 《贵州省统计年鉴》第2回，转引自魏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675页。

业也日益繁盛，成为大后方的商业中心。抗战期间大后方城市的商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规模急剧膨胀。这主要体现在商业用地的扩大，商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商业资本的猛增。以成都为例，成都商业场原系清末开办的劝业场，抗战时期在原址上扩建商业、悦来和新集路三大商场，新修店铺300余间，较原来劝业场大一倍，三大商业场的匹头百货业占半数以上，匹头铺的刘万两、京货局的敬益增，分别以富丽堂皇和货卖堆山取胜。二是职业构成发生变化。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商业人口所占比重有较大增加。相关研究表明，1941年，重庆全市的商业从业人员达106083人，超过工矿业从业人员（9200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1%，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9.8%。而至1945年，商业从业人员更猛增至23427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8.6%，占全市从业人员的39%。^①商业资本在战时也有较大扩张，抗战前夕重庆的商业资本总额不过千万元，到1941年已经增长为12583万元，1942年更是猛增为49535万元。同时，商业企业平均资本也在增长，战前重庆商业企业的平均资本额仅为2000元左右，到1941年增至8823元，1942年则增至19111元。^②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商业网络。^③战时随着西南大后方各省商业市场的发展与互动的强化，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以各省省会城市为次中心、以不同层级城市为区域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商业网络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某些商业联系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但仍然有助于大后方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扩大，由此推动了该区域商业市镇、小型集散市场、高级市场以及商贸中心等不同层级商业网络的发展。

2. 西南大后方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

（1）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迁驻重庆，重庆的城市行政地位得以

^① 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第117~118页。

^② 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第117页。

^③ 商业网络的提法与经济史研究的兴盛不无关系，商业网络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也是研究商业发展的一个极佳视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商业网络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学者对商业网络的形成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包括血缘、地缘、业缘、文缘、善缘等。这方面的研究在滨下武志、古田和子、顾德曼（Bryna Goodman）、朱荫贵、朱英、冯筱才等人的一些著述中均有体现，在此不一一列举。这里所言“以重庆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套用了古田和子对网络的解释，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即抗战时期大后方形成的以重庆为最核心层级的市场体系以及在这一体系中重庆同各节点城市商业的内外连通，它是一种“支配着空间的关系”。